

记忆、统治与“造宋”文学

——以谢瞻《张子房诗》为中心

张 月

[摘要]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文化记忆；统治；“造宋”；谢瞻；刘裕；张良

谢瞻《张子房诗》收录于《文选》咏史类中，该诗虽冠绝当时，但从文学史角度看，此诗较少受到后世学者关注，也没获得较高的文学地位，甚至负面评价较多。例如方东树评论：“谢宣远《子房诗》，铺陈典贍，当时以为冠，此特应制好手耳。”^① 他认为此诗不过是应制诗歌的典范，其歌功颂德的基调突出，缺乏文学品质与个人情思。何焯《义门读书记》评论：“从衰周说起，议论剧有根柢。自神武以下，兼叙今事，盖咏古兼应教也。时刘裕犹为人臣，瞻之比拟，无乃不伦。后有采诗者，自此以下可以不录，皆凡语耳。”^② 他认为该诗咏怀张良的部分议论得当，而叙述今事的部分则具有诗教性质，其以赞颂君王的口吻赞颂作为人臣的刘裕，不仅有违朝臣的操守，而且其歌功颂德的内容本身文学性也不高。

虽然谢瞻《张子房诗》常受后代文人诟病，但若从不同角度考察，则《张子房诗》呈现不同属性：从创作要求看，该诗是应刘裕要求所作的应制诗；从创作性质看，刘裕作为文人集会的领导者，该诗可作为文学雅集的代表；从诗歌内容看，这是途经张良庙时所作的纪行诗，虽然谢瞻并不在现场，但诗歌却呈现出强烈的当下感和现场感；从诗歌类别看，该诗被《文选》列入咏史类。另外，对该诗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晋宋之际的文人心态变化。该时期出现了门阀士族权力逐渐衰微、武将势力逐渐增强的政治形势，这扭转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共掌的局面。世家大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人心态。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引，解读谢瞻的《张子房诗》，并勾连傅亮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从武帝平闽中诗》《从征诗》《为宋公修复前汉诸陵教》、谢灵运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郑鲜之的《行经张子房

作者：张月，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研究员，bnuzhangyue@gmail.com。

* 本文系澳门大学 MYRG 科研基金项目“历史在古代文学中的呈现特点”（MYRG2022-00058-FAH）的阶段
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1，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②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46，894页，中华书局，1987。

庙诗》、范泰的《经汉高庙诗》以及谢瞻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于安城答灵运》，以期展示在风云诡谲的晋宋易代之际文人的心态变化，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努力。^①

一、谢瞻及其《张子房诗》的创作背景、文化记忆属性

谢瞻字宣远，谢晦之兄，曾任豫章太守。谢瞻年少成名，《宋书》记载：“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②《紫石英赞》《果然诗》等作品使其崭露头角。另外，他通过“乌衣之游”确立了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认同，提高了其社会影响力。^③谢瞻仕途经历丰富：“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④在其多变的政治生涯中，谢瞻前后期的性格变化显著：前期为人自傲，后期则行事谨慎。有学者认为谢混被杀是致使其心态转变的关键事件。^⑤谢混是谢安之孙，其身陈郡谢氏也曾参与“乌衣之游”，与谢瞻、谢灵运、谢晦等人有所往来，后因加入刘毅集团而被刘裕所杀。尽管如此，谢氏家族仍需刘裕身边为其服务。因此，他们的内心处境颇为复杂：一方面，世家大族在此时遭到下层武士及次等贵族的打压；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家族延续和个人发展而不得不屈从于刘裕。对于世家大族的没落现象，罗宗强指出：“不仅谢氏一门如此，其他高门世族，也同样感受到最初到来的衰败的气息。他们也同样在位尊望重的外表下，面对日渐衰败的现实。他们的愿望与能力，已不再是拥有中枢实权，而是自保家门而已”^⑥。作为高门典型，谢氏家族成员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影响了谢瞻的文学创作。李世萼以谢混被杀事件为界，将谢瞻的创作风格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以清悟的自然风光、自然景物和巧妙的兴托，以求得媚趣，思想感情的表达比较冲淡、平和……后期则主要以叙事件、陈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内心的情绪；随着对家族的忧虑和社会阅历的加深，思想感情更趋向于蕴藉、深沉”^⑦。《张子房诗》便是谢瞻后期作品的代表。

关于《张子房诗》的创作背景和本事，《宋书》有载：“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军次留城，经张良庙”^⑧。除此之外，《文选》注引王俭《七志》也提及：“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瞻之所造，冠于一时”^⑨。高祖刘裕曾是东晋后期的将领，在义熙年间（405—418年）逐渐掌握实权。此处的“一时”应指谢瞻诗在当时受到了超出众人的肯定和赞誉。一方面，谢瞻的作品虽为应制诗，但不乏兴托，引经据典，且用词精炼，体现诗家笔法。评论者王

① 对“造宋”的研究，学者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展开论述，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340—3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137—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陈群：《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载《中国史研究》，2002（3）。从文学角度考察“造宋”的研究侧重刘裕北伐之际的征行记，如森鹿三：《刘裕の北伐西征とその从军纪行》，载《东洋史研究》，1937，3（1）；刘苑如：《见与不见的战争——论记体与赋体及刘裕北伐》，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9期，2016；田峰：《刘裕“造宋”与晋宋之际的征伐随记》，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1）。与前贤的侧重点不同，本文围绕以刘裕北伐时拜访过的历史遗迹为题材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从记忆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探讨“造宋”文学。本文部分内容在笔者有关六朝咏史诗的英文专著中有所阐述。

② 关于谢瞻的生平，参见沈约：《宋书》卷56《谢瞻传》，1557页，中华书局，1974。关于谢瞻的研究，参见李世萼：《论晋末宋初诗人谢瞻》，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

③ 关于“乌衣之游”，参见沈约：《宋书》卷58《谢弘微传》，1590—1591页，中华书局，1974。

④ 沈约：《宋书》卷56《谢瞻传》，1557页，中华书局，1974。

⑤ 李世萼：《论晋末宋初诗人谢瞻》，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丁福林：《从刚躁负气到处贵遗权——谈东晋山水诗人谢瞻》，载《古典文学知识》，2003（5）。

⑥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182页，中华书局，1996。

⑦ 李世萼：《论晋末宋初诗人谢瞻》，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

⑧ 沈约：《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41页，中华书局，1974。

⑨ 萧统：《文选》卷21《咏史·张子房诗》，9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俭本人撰《七志》时正“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①。其作为刘宋重臣，对于谢瞻为刘裕应制所写的颂德之诗，能够身临其政治环境进行接受和评价。另一方面，诗歌的优劣评定很可能来自当时的统治者，而就当时而言最有权威的评价者应是刘裕。其有意进行文化造势，推举谢瞻为其颂德之诗，也让其有更充分的理由提高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地位。

刘裕为“造宋”而在军事征伐与文化造势方面均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义熙十一年（415年），刘裕消灭南方各种势力集团；义熙十二年（416年），他开始率兵北伐；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途经张良庙，修缮庙宇、拜祭张良、命文官作诗。此时便有傅亮为应制颂德而写作了《为宋公修张良庙教》：

纲纪：夫盛德不泯，义存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夷项定汉，大拯横流，固已参轨伊望，冠德如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涂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顿，遗像陈昧，抚事怀人，永叹实深……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蘋蘩行潦，以时致荐。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②

教文极力赞颂了张良的品德，将之与古代的先贤管仲、颜回相提并论，还高度概括了张良的功绩，将之与伊尹、姜子牙并举。而后其笔锋一转，提到张子房庙如今荒凉残破，借此烘托修缮张良庙的必要性及刘裕对张良的景仰，从而体现刘裕不忘先贤的美德。另外，刘裕要求定期祭奠张良，使之永传后世，这有助于形塑当时及后世对张良的记忆。谢瞻的《张子房诗》也同样因此事而作，诗歌彰显了刘裕对张良的仰慕。全诗如下：

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卜洛易隆替，兴乱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虐暴三殇。息肩缠民思，灵鉴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来扶兴王。婉婉幕中画，辉辉天业昌。鸿门消薄蚀，垓下殒揜抢。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惠心奋千祀，清埃播无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銮旂历颓寝，饰像荐嘉尝。圣心岂徒甄，惟德在无忘。逝者如可作，揆予慕周行。济济属车士，粲粲翰墨场。瞽夫违盛观，踈踊企一方。四达虽平直，蹇步愧无良。飡和忘微远，延首咏太康。^③

此诗按叙事内容分为四层：第一到三联写周朝末年动乱，秦统一中国，但律令严苛，百姓备受煎熬；第四到十联叙述汉承天命推翻秦朝，建立大一统，张良对此居功至伟；第十一到十六联着重吟咏刘裕的历史功绩及不忘先贤的美德；第十七到十九联谈及创作缘由并遥想亲身祭奠张良庙的心情。《张子房诗》记录了在晋宋易代之际，刘裕率领文武百官缮治张良庙，并以瞻仰、庆典、诗歌吟咏等方式缅怀张良，使其事迹在集体成员的文化记忆中得以保存。文化记忆往往通过仪式、展演的方式进行流传，围绕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展开。谢瞻《张子房诗》的创作方式就具有此特征。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关于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方面谈道：

文化回忆中具有某种神圣的因素。回忆形象具有宗教意义，对它们的现时化往往都带有节日的性质，节日的作用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对奠基式的过去进行现时化。回忆着的群体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其认同。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

① 萧子显：《南齐书》卷23《王俭传》，433页，中华书局，1972。

② 萧统：《文选》卷36《教·为宋公修张良庙教》，1640-16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关于《为宋公修张良庙教》的研究，参见童岭：《义熙年间刘裕北伐的天命与文学——以傅亮〈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为中心》，载《中华文史论丛》，2019（3）；程章灿：《冢墓：作为刘宋的文化场域》，载《中国文化》，2021（1）。

③ 萧统：《文选》卷21《咏史·张子房诗》，998-10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①

在这里，仪式带有节日的性质，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裕命令群臣集体参与作诗、舞乐，使对张良的祭奠活动具有了节日性，成为关于张良文化记忆的重要部分。后世的文人墨客途经或拜访张良庙时也会感怀作诗，从而使张良的形象和故事逐步流传发展。此外，对逝者的回忆，可以分为“回溯性回忆”和“前瞻性回忆”。^② 谢瞻对张良的回忆便同时包含此两种，换言之，两种回忆是一体的两面。在祭奠张良时，谢瞻以“回溯性回忆”的方式建立与历史人物的联系，将人物带入当下的语境；在悼念历史人物时，又以“前瞻性回忆”的方式赞颂刘裕的功绩和品德。同时，就开展祭奠张良的活动而言，刘裕意欲借塑造张良的文化记忆来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谢瞻此诗无疑迎合了刘裕这一想法。对此，我们可以从张良形象的塑造、刘裕北伐及其形象建构、晋宋易代之际武将与士族关系的消长三方面进行理解。

二、张良形象的塑造

刘裕大军北伐途经许多名胜古迹，但只在个别地方召集百官创作诗歌，张良庙就是其中之一。显然，刘裕对地点和历史人物的选择有其目的。就宣传角度而言，作为宣传符号的“张良”故事性很强，且包含了士人所追求的“士遇知己”与“功成身退”的要素。“士不遇”是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等都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刘裕北伐命群臣作诗正为士人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张良故事中的“士遇知己”要素可引起随行臣属的共鸣。《张子房诗》中的第七联“鸿门消薄蚀，垓下殒揜抢”总括张良在汉朝建立前所成就的卓著功勋，并选取了两个重要事件加以体现：逃脱鸿门宴使刘邦转危为安；垓下之围与四面楚歌使刘邦赢得楚汉之争。谢瞻用凝练的诗家笔法，通过提取关键词来描绘重大事件，叙述了张良“士遇知己”后立下的种种功绩。第八联“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谈及战乱平定、汉朝建立之后，张良又帮助刘邦赢得朝臣之心，奠定了汉朝繁盛的基础。第八联首先提到，建立汉朝以后，刘邦在如何论功行赏、统率百官等方面接受了张良的建议，如封赏仇敌雍齿，以显示其不计前嫌的态度，让百官看到封赏的希望，从而打消造反的念头。^③ 为进一步稳固政权，张良向刘邦推举萧何为宰相。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知人善任，使得“士遇知己”。第八联后半部分提及张良在定都与护太子之事上的智谋。在定都问题上，张良指出以洛阳为都的弱点，于是刘邦选择定都长安。^④ 在立太子问题上，张良建议吕后请来商山四皓，成功化解太子被废的危机，最终刘邦只能感叹“羽翼已成，难动矣”^⑤。谢瞻描写张良时运用“消”“殒”“建”“护”四个简短有力的动词，高度概括了张良政治生涯的数项重大决策，展示出其卓越的谋略和功绩。

“功成身退”同样为士人们所追求。张良能被后人铭记，不仅因其对汉朝的贡献，还因其功成之后能够急流勇退。《张子房诗》第九联“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谈论张良的隐退之举，后半句化用了《庄子》语句：“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⑥。“功成身退”使张良既避免了如韩信等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结局，又通过建功立业使自己永载史册。第十联“惠心奋千祀，清埃播无疆”对张良进行称颂，认为其事迹会在“千祀”之时间和“无疆”之空间两个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扬·阿斯曼对这两种回忆的阐释如下：“回溯性的对亡者的回忆是一种更为普遍、原始和自然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群体和他们的亡者共同生活，将亡者不断带入持续向前的当下，以此方式构建出一幅关于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图像，而亡者自然而然地也被纳入这幅图像中。”相比而言，对于前瞻性回忆，他认为：“人们在悼念亡者时，注重的是‘功绩’‘名望’，以及获取不朽声誉的方式和形式。”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56-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④⑤ 司马迁：《史记》卷55《留侯世家》，2042-2043、2043-2044、2047页，中华书局，1959。

⑥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5上第12《天地》，421页，中华书局，1961。

层面得以流传。谢瞻用“惠心”和“清埃”赞颂其人格高尚，并暗指追随刘裕的人才能像张良一样，不仅可以展现自身才能，还可在功成之后安享晚年。谢瞻通过对张良事迹的回忆，帮助刘裕延揽人才，增强文臣武将建立功业的热情与动力，使刘裕能实现他的政治目标与诉求。

在张良形象建构方面，《张子房诗》突出了对秦朝过失的描写：“力政吞九鼎，苛虐暴三殇”，这为下文张良的出场铺陈了场景。该诗中的第四至六联“息肩缠民思，灵鉴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来扶兴王。婉婉幕中画，辉辉天业昌”，先回顾历史再引出张良，“息肩”二字形象地表达了百姓对减轻重担、远离苦难的期许，从而说明秦亡汉兴是民心所向。随后，诗中又以“灵鉴”收集“朱光”作比来形容汉取代秦是天命所归，从而使刘邦的统治合法化。另外，第十一、十二联“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赞颂了刘裕在祭奠张良时展现的仁慈和义举。谢瞻深知刘裕想借祭奠行为营造气氛，为掌权作铺垫，因此，其在诗中突显了张良的谋略，通过建构张良的正面形象来为刘裕进行造势。

相比之下，谢氏家族的另一名成员谢灵运在《张子房诗》创作多年后写作的诗歌，突出了张良暴力的一面，因此引祸而丧命。据《南史》所载，元嘉八年（431年），谢灵运被贬为临川内史，后又因游山玩水、疏于政务被当地官员弹劾，而面对指控，他却逮捕了地方官员。谢灵运在以下四句诗中表达了他的愤懑之情：“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①诗人自比张良和鲁仲连，将暴力的秦朝与刘宋王朝类比，表达了对刘宋的鄙视与轻蔑。宋文帝读到此诗后，将谢灵运贬至南海，而谢灵运却找人营救自己。宋文帝大怒，将谢灵运赐死。^②与谢灵运的鲁莽相比，谢瞻的谨小慎微便表现在对张良故事叙述角度的选择上。从后视者的角度看，谢瞻的选择是明智的。他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在乱世之中免于祸乱，同时也希冀自己不要因不了解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招致不幸，因此，他借《张子房诗》表达了对刘裕的忠心。以上是从张良的历史故事及其人格影响力角度来探讨张良形象被建构的历程和原因。

三、刘裕北伐及其形象建构

刘裕本人的政治意图也可以作为解释谢瞻吟咏张良的原因。对此，前贤学者已有讨论：其一，谢瞻借称颂张良表达晋宋易代之际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③其二，刘裕渴望得到像张良那样的良臣，谢瞻领会其意，作诗呼应。^④两种观点都说得通。刘裕渴望贤才，虽然其麾下人才济济，但心腹重臣可能不多，刘穆之便是其中一位。刘裕重用刘穆之，北伐时便让其留守南京，并给予其极大权力。《宋书》有云：“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谄谀，盈阶满室……不相参涉，皆悉瞻举。”^⑤可见刘裕对刘穆之充满信任，而后者也以出色的政绩回应了刘裕。当刘裕得知刘穆之的去世时，立即班师回彭城。此时，朝廷大事都需要直接禀报刘裕。这足见刘穆之的重要性及刘裕麾下干将的缺乏，故此他才求贤若渴。

在刘裕以前，夺取政权的“借口”多种多样：或以出现祥瑞、灾祸的预兆为由，或强调文化上的主流与优越性，或分辨华夷的不同，或突出地理位置的中心以及民心所向等。刘裕获得正统性的手段也是多样的。他有意通过凭吊著名历史人物、命臣僚作诗以及举办仪式和庆典来彰显自己执掌政权的雄心。《张子房诗》第十一、十二联“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便转向对刘裕的歌颂。“神武”暗指刘裕，“睦三正”指协调天、地、人。此后谢瞻再用“明两”和“庆霄”来赞颂刘裕的功绩恩泽四方。在第十三、十四联“銮旂历颓寝，饰像荐嘉尝。圣心岂徒甄，

①② 李延寿：《南史》卷19《谢灵运传》，541、541页，中华书局，1975。

③ 丁福林：《从刚躁负气到处贵遗权——谈东晋山水诗人谢瞻》，载《古典文学知识》，2003（5）；陈群：《“吏能之士”与“文义之士”：宋初的文士之争》，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S2）。

④ 王晓萌：《东晋末年政局的动荡与文风的转变》，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1）。

⑤ 沈约：《宋书》卷42《刘穆之传》，1306页，中华书局，1974。

惟德在不忘”，谢瞻谈及创作的背景及目的。在汉朝之后的几百年中，战乱频仍使得民不聊生，以致像张良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少有人祭奠、瞻仰。晋安帝司马德宗得知刘裕修葺张良庙的善行后，追封其先祖，《宋书》有载：“天子追赠公祖为太常，父为左光禄大夫，让不受”^①。刘裕出身行伍，他需要令群臣信服自己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刘裕通过“让不受”来塑造自己伟岸的形象，并借此向群臣展示自己的美德，从而逐步建立自身权威。

刘裕通过祭扫张良庙及命臣子作诗称颂先贤的方式，以昭明世人：他能够匡复天下、尊贤纳士、定边安民。第十五、十六两联“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济济属车士，粲粲翰墨场”以假设引起诗句，将历史和现实融合在同一画面中。谢瞻通过运用“济济”“粲粲”等叠音词，强调众多杰出的文臣武将尽纳刘裕麾下，即使古人死而复生也会羡慕不已。在刘裕的北伐途中，他也进行了其他类似修葺张良庙并命群臣赋诗的造势活动，包括命文臣创作军事纪行诗。例如，傅亮《从武帝平闽中诗》：“鞠旅扬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元戎启行。弭楫洪河，总辔崇芒”^②。此诗描写了刘裕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北伐，气势如虹。傅亮的另一首《从征诗》与前首类似：“息徒西楚，伫楫旧乡。止犹岳立，动则云翔。烈烈群师，星言启行。泛舟掩河，秣马登芒。”^③此诗描述了北伐的行军路线与军队的盛大气势。在北伐途中，刘裕积极对其军事征伐进行文学宣传，既利于军队团结一心、勇猛杀敌，又利于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总之，具有政治野心的刘裕为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不断努力，并试图通过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显示出自己的夺权为天命所归。

与谢瞻同时代的郑鲜之也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参加了祭奠张良的仪式和诗会，并写作了经张良庙的同题诗歌《行经张子房庙诗》：“七雄裂周纽，道尽鼎亦沦。长风晦昆溟，潜龙动泗滨。紫烟翼丹虬，灵媪悲素鳞”^④。“裂”字形象地表现了不同诸侯国分裂周朝，使社会陷入连年战争。这首诗与《张子房诗》的前两联“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卜洛易隆替，兴乱罔不亡”相似，强调了周朝割据的纷乱局面，为张良的出场以及辅佐刘邦重拾山河提供了历史舞台。谢瞻和郑鲜之的诗歌均采用了“回溯性回忆”的视角来塑造张良和刘邦的英雄形象。不同的是，谢瞻侧重描述张良帮助刘邦赢得天命；郑鲜之则暗用了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而该典故很可能是刘邦或其臣下为了将其起义合法化而编造出来的。综合以上分析，刘裕拜访、修葺张良庙并举行祭奠仪式，是其为了获得掌权的合法性、赢得士人尊重而进行的造势行为。他想通过延续张良的文化记忆，以重拾群臣的信心，巩固自身的威望。同时，刘裕也将自己塑造成渴望能臣的贤君，试图在群臣之中建立起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也让后世士人记得他在文化传承上的功劳。

在谢瞻与郑鲜之创作相关纪念诗歌数月，范泰在刘裕北伐途中也创作了纪念刘邦的诗歌。刘邦庙所在地正是刘裕的出生地彭城。刘裕自称汉室后裔，因此在义熙十三年九月前往刘邦庙祭祖，以树立他掌权的正统性。在此背景下，范泰写作了《经汉高庙诗》：“嘯咤英豪萃，指挥五岳分。乘彼道消势，遂廓宇宙氛。重瞳岂不伟，奋臂腾群雄。壮力拔高山，猛气烈迅风。恃勇终必挠，道胜业自隆”^⑤。本诗虽未提及具体的历史人物，但标题引导读者自然地联想到刘邦。诗歌描述了刘邦以伟岸的人格及令人尊敬的地位吸纳贤才，并以反问句凸显了项羽的勇猛气概，从而衬托出战胜他的刘邦更加伟大。此诗最后总结历史经验，认为“道”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此外，刘裕在长安还命傅亮写作《为宋公修复前汉诸陵教》：“夫信陵之坟，守卫无旷；展季之陇，樵苏有刑……汉高拨乱反政，大造区宇，道拯横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义在不泯”^⑥。该文描写了汉前贤才信陵君与柳下惠之墓受到后世的保护，以体现刘裕对前贤的敬仰，并叙述刘邦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成功完

① 沈约：《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41页，中华书局，1974。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1，1139页，中华书局，1983。逯氏认为，“闽中”当改为“关中”，语意才通。

③④⑤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1，1139、1143、1143-1144页，中华书局，1983。

⑥ 许敬宗：《日藏弘文本文馆词林校证》卷699，461-462页，中华书局，2001。

成统一,凸显其功绩和道德节操。刘裕承续了前代君王如刘邦对贤才的尊重,把自己放在了重要人物的序列中,有助于人们在关于先贤的文化记忆之中联想到自己,从而借由先贤形象提升自我形象。在拜访刘邦庙之后,刘裕又在未央殿会见文武群臣。^①未央殿是西汉皇帝的寝殿,许多重要的政令出于此地,这更体现了刘裕为夺取政权进行了步步为营的准备。

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刘裕除了拜谒张良庙和刘邦庙,还追溯了族谱,自称是汉高祖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在义熙十四年正月,刘裕命傅亮作《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夫褒贤崇德,千载弥光,尊本敬始,义隆自远。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藩斯境;素风道业,作范后昆……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可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便可施行”^②。该文延续了傅亮此前“教”的结构,先点出刘裕敬重先祖的意义,随后概括楚元王的业绩。刘裕命人扫墓、守灵、祭奠,使楚元王的事迹流传千古。由此可见,刘裕在北伐途中拜祭张良庙、刘邦庙、楚元王墓,意在显示自己乃汉室后裔,延续的是祖上的基业。至此,刘裕为夺取政权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资本:在政治军事上,刘裕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军事征伐获取政绩和官职;在文化上,刘裕通过凭吊张良体现自己求贤若渴的态度,并运用对张良的文化记忆建立起自身与汉朝的联系,赢得民心。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登基,发布诏令,称晋代皇室一再遭遇磨难、气数已尽,自己乃天命所归:“晋氏以多难仍遭,历运已移,钦若前王,宪章令轨,用集大命于朕躬”^③。

四、晋宋易代之际武将与士族关系的消长

东晋时期,皇帝与世家大族共掌朝政。然而到了晋宋之际,二者的关系则发生了变化,对此,田余庆指出:“昔日决断机枢的门阀士族,一般都无所作为……东晋统纪由次等士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东晋义熙政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历史内容,无非是为门阀政治回归皇权政治准备必要的条件”^④。义熙年间,虽名义上仍是东晋政权,但实则皇帝已被架空。刘裕以军事起家,通过排除异己的方式掌握实权。此时,士族的政治军事势力逐渐衰弱,但其文化影响力仍在。刘裕要想建立政权,则需获得文化领域的支持,为此他召集僚僚进行诗会,试图拉拢门阀贵族,以扩大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与其立场相左的门阀士族遭到了大面积血洗。后来,刘宋通过“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方式进行统治,更证明了门阀士族逐渐衰落、皇权逐渐集中的政治趋势。^⑤

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形势变化以及崛起的武将和衰落的士族之间权力的转移,都不免影响当时文人的心态:“高门世族如王、谢,南渡之后之所以地位显赫,除了他们的门第,他们的文化素养之外,便是因为他们握有实权。而如今,他们虽居令、仆、三司,位尊望重,而其实并无实权……他们在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减轻了”^⑥。谢瞻的《张子房诗》正体现了上层士人于政治转型期的复杂心态:世家大族在衰落之时,既希望家族中的人物能挽狂澜于既倒,也对政治斗争的惨烈心有余悸。谢氏家族曾大权在握,如谢安曾手握北府兵权,而如今的军队实权尽数掌握在刘裕手中,成为其北伐的重要力量。谢氏家族成员试图恢复以往的政治影响力,无奈次等贵族、寒族、武士拥有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和兵权。据此,谢瞻在《张子房诗》最后三联写道:“瞽夫违盛观,踈踊企一方。四达虽平直,蹇步愧无良。飡和忘微远,延首咏太康”,叙述了自己虽身不可至,但

① 沈约:《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42页,中华书局,1974。

② 萧统:《文选》卷36《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1642-16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 沈约:《宋书》卷3《武帝本纪下》,52页,中华书局,1974。

④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346-3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⑤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⑥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180-181页,中华书局,1996。

可通过遥想祭奠场景来歌咏刘裕美德。^① 作为全诗的结尾，谢瞻多次自谦“瞽夫”“无良”以及“微远”，把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意图表现对刘裕领导有方的赞誉，间接地传达了自己对刘裕的忠诚与臣服。晋宋易代之际，风云诡谲，政治斗争惨烈，文人们的创作展示出他们在政治转型期为迎合刘裕而歌功颂德、明哲保身的态度。事实上，谢瞻的此种态度不独体现在《张子房诗》中。在其创作该诗后一年，即义熙十四年重阳节，刘裕在彭城戏马台为尚书令孔靖举行宴会，命令群臣作诗，欢送其归隐。^② 谢瞻也参与其中，创作了《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全诗如下：

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阳彩，密苑解华丛。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圣心眷嘉节，扬銮戾行宫。四筵沾芳醴，中堂起丝桐。扶光迫西汜，欢余讵有穷。逝矣将归客，养素克有终。临流怨莫从，欢心叹飞蓬。^③

孔靖是刘裕心腹，跟随并帮助刘裕打败桓玄。^④ 当孔靖准备解甲归田时，刘裕于戏马台大摆宴席，送别孔靖。本诗首先从自然环境着笔，点明时令是重阳之日。秋季在中国文化中常与沉郁哀伤的感情色彩相连，而在此诗中该色彩却并不浓重。有学者指出诗中愉快的氛围源自诗人所处的宴饮场景，刘裕的出现消除了秋天的肃杀气氛。^⑤ 诗歌后又赞扬了宴会的气派，最后切题惜别尚书令孔靖。谢瞻在诗中联想到自身处境，从而发出“身如飞蓬”的慨叹。谢灵运也见证了百官随刘裕在重阳节登高望远的场面，并写作了同题诗：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⑥

同样是送别诗、应制诗，谢灵运笔下的场景则萧瑟黯淡许多。“边朔苦”“霜雪”“凄凄”“寒潭”等词的运用营造了阴冷压抑的氛围。最后两联虽明写送别，实则抒发了自己无奈的处境。谢灵运可能作于同年岁末的《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再次抒发了这种落寞的心绪：“草草眷徂物，契契矜岁殚。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欢。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晚暮悲独坐，鸣鼙歇春兰。”^⑦ 岁暮之际，草木凋零，传来的楚歌吴曲更使漂泊在外的诗人想念家乡，由此心情愈发沉重，加速了衰老。结句用《离骚》之典暗示自己无发挥才能的机遇，心绪更为低落。同是谢氏家族成员，谢瞻和谢灵运由于性格不同，在易代之际的生活经历也不同，从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和基调。

谢瞻的《张子房诗》和《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基本代表了谢瞻后期诗歌的创作风格，其歌功颂德的基调除了受应制诗的体例限制以外，还受其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易代之际文人

① 学者们关于谢瞻当时是否随刘裕大军祭扫张良庙存在争议。美国学者陈美丽（Cynthia L. Chennault）点评了唐代文选笺注者刘良的观点。她认为谢瞻不在现场，因为他当时在豫章任职。因此，刘良的说法不对。另一种观点来自李善，他引用《七志》的说法，认为谢瞻当时在安城任职，但是刘裕命令其到张良庙，一同参拜、赋诗。然而，这种说法没有其他证据支撑。依据目前的材料，我们很难确知谢瞻当时所在。根据诗歌呈现的内容，“违盛观”暗示谢瞻当时不在场。Cynthia L. Chennault, “Lofty Gates or Solitary Impoverishment? Xie Family Member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ung Pao*, 1999, 85 (4/5): 284-285.

②③⑥ 萧统：《文选》卷20《公宴·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956、956-957、960-9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④ 沈约：《宋书》卷54《孔季恭传》，1531-1532页，中华书局，1974。

⑤ Fusheng Wu, *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anegyric Poet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pp. 77-79.

⑦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2，1158页，中华书局，1983。

心态的突出特点。《南史·谢晦传》中曾记载谢灵运、谢晦和谢瞻评价潘岳、陆机与贾充，谢瞻的看法是“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①。为远离政治漩涡，谢瞻甚至主动要求贬职。^② 谢瞻在与家族成员的交流中也流露出其明哲保身的态度。在义熙十一年创作的《于安城答灵运》一诗中，他写道：“跼行安步武，锻翮周数仞。岂不识高远，违方往有吝。岁寒霜雪严，过半路愈峻。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进。行矣励令猷，写诚酬来讯”^③。谢瞻采用自谦的口吻，承认了谢灵运的才能，同时提醒其明哲保身的重要性。可见，谢瞻担忧家族中头角峥嵘、个性独立的成员。从后视者的角度来看，他的担忧成为现实。文采出众的谢灵运在被弹劾时全然不顾政治时局，以诗泄愤，被贬南海，最终被赐死；善于言辞、深得刘裕器重的谢晦也因为没听取谢瞻低调为官的建议而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殒身。

本文以谢瞻的《张子房诗》为中心，勾连晋宋易代之际的多篇文学创作，如傅亮的多篇教文、郑鲜之和谢灵运的张良诗、范泰的刘邦诗、谢瞻和谢灵运的送别诗诸作品。这些文人大多借历史题材与遗迹来歌颂刘裕。这些北伐时期的文学作品对刘裕树立权威、建立文化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易代之际的文人运用了记忆的回溯性和前瞻性特点来纪念历史人物，将刘裕置于伟大人物的序列中，并强调这些人物所具有的历史和道德使命。

从记忆的两面来看，“回溯性回忆”能帮助阐释历史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而“前瞻性回忆”则有助于理解统治者稳固统治的过程与手段，即刘裕通过怀念历史人物而使自己被称赞，从而进入文化记忆之中。当文人写作吟咏历史人物的作品时，他们不仅将较长的历史叙事浓缩成精炼的文学作品，更通过对历史中特定部分的选择性记述来表露想法。刘裕运用回溯性和前瞻性回忆的方式纪念汉代历史人物，既指导当下，也预示未来。文化记忆学者扬·阿斯曼讨论了谱系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谱系跨越了当下和起源时期之间的缺口，天衣无缝般地将这一缺口织入起源时期，并论证了现时秩序及权利要求的合法性。”^④ 刘裕通过自称是西汉楚元王的后代来粉饰其谱系，以回溯性的方式，用过去建立的合法政权使自身当下的夺权行为正统化。同时，他运用前瞻性回忆突出其道德节操的高尚，以塑造其英明形象。他不仅通过修葺张良庙等义举间接地向臣僚展现其统治可以重新恢复社会秩序，还通过命文臣创作诗文来颂扬自己祭奠前人的壮举和品德。这种声称自己天命所归、歌颂历史人物及进行北伐的文化、政治、军事造势活动，为其谋求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刘裕的尊贤崇礼、求贤若渴也通过臣僚的文学创作间接地表达出来。他通过拜访刘邦庙、张良庙等古迹，将其祭奠和敬仰前代的行为与汉朝先贤的成就联系起来，将过去代入当下的语境中，从而展示他的价值观与身份认同。敬仰先贤是刘裕的一种表态：尽管他是一介武夫，但其求贤若渴，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因此，刘裕的善举同时也增强了臣僚对其品德、人格的认同。通过纪念汉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些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将历史的厚重感通过文本和记忆流传后世。

刘裕北伐时的文学作品还创造了一种缺席的声音，重塑了汉文化的认同感。这一时期的文人如谢瞻、傅亮、郑鲜之、范泰等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把消逝的历史碎片重组，借前代留存的文本启示后人：尽管伟大的历史人物和辉煌过去已经消亡，但遗存下来的物质载体所承继的历史能通过文人的想象再次呈现。这种想象在塑造消逝的历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晋宋之际的文学作品所歌咏的历史人物大多来自强盛的西汉时期。作为历史上的强大帝国，西汉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能被偏安一隅

① 李延寿：《南史》卷19《谢晦传》，526页，中华书局，1975。

② 沈约：《宋书》卷56《谢瞻传》，1557-1558页，中华书局，1974。

③ 萧统：《文选》卷25《赠答·于安城答灵运》，1191-1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④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的东晋末年文人所感受。他们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强大的汉代文化认同感正逐渐消失，汉代重要历史人物的遗迹逐渐湮没无闻，鲜有人按时祭奠，但正是通过这种缺席，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才真正感觉到历史的厚重。“造宋”文学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某种程度上是晋宋易代文人在刘裕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下，试图对汉代文化之蓬勃力量的回光，以及对重现西汉那般强盛王朝的希冀。

通过文学创作与祭奠活动，文化记忆得以传承。本文所探讨的晋宋易代之际的文学作品记录了刘裕拜访历史遗迹以及对其进行瞻仰和缮治的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与诗歌吟咏，刘邦、张良等历史人物的事迹能在后世流传广泛。其中，刘裕的善举为这些历史人物的流传平添助力，使他们的故事和形象在文化记忆中得到完善和发展；刘裕本人的伟岸形象也在对先贤的祭祀中得以树立。在不断的回忆中，历史人物形象得到了重新整合、塑造，增添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影响深远。仪式和节日是文化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①。在重阳节为孔靖送别体现了刘裕对朝臣的尊重，更有利于朝臣凝聚。通过写作诗歌、集体的表演和参与，祭奠活动便具有了节日性质。此后，文人墨客途径或祭拜遗迹时也会感怀创作，使其历史故事传承下去。在刘裕组织送别后，戏马台这一场景也进入了后代的文化记忆中。例如，唐代储光羲《登戏马台作》“君不见宋公杖钺诛燕后，英雄踊跃争趋走。小会衣冠吕梁壑，大征甲卒碣磳口。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飧六军”^②。谢瞻的《张子房诗》和为孔靖所作的宴饮饯别诗，以及谢瞻回复谢灵运的诗歌都是刘裕逐步建立文化自信的展示。同时，这些诗歌也反映了谢瞻在政治转型期的矛盾心态：他既希望为官参政，又担心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招致灾祸。谢瞻深知魏晋名士处境艰难，少有全其身者，家族亲人又惨遭屠戮，于是他恪守明哲保身的理念，以谨慎的处世行为和文学创作表达其对刘裕的忠诚与臣服。

Memory, Governance, and the Literature that Created the Liu-Song: Centering on Xie Zhan's "Poem On Zhang Zifang"

ZHANG Yu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Abstract: Considered outstanding by his contemporaries, Xie Zhan's "Poem On Zhang Zifang" nevertheless has not been well received by later scholars. If one examines this long po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memory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its significance is noticeable. This article reads this poem in connection with many other works composed by Fu Liang, Zheng Xianzhi, Fan Tai, and Xie Lingyun during the Jin and the Liu-Song dynasties. This reading reveals the subtleties reflecting Liu Yu's attempt to use cultural memory of distinguished historical figures, such as Zhang Liang and Liu Bang, to express his longing for virtuous talents and to legitimize his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Poem On Zhang Zifang"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aiming to create the Liu-Song to highlight the change of power in military generals and scholarly clans during the Jin and the Liu-Song dynasties, and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works praising merits and virtues.

Key words: Cultural memory; Governance; Creating the Liu-Song; Xie Zhan; Liu Yu; Zhang Liang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138，1407页，中华书局，1999。